

从“改造自然”到“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反思与发展

裴冬青

信阳学院外国语学院, 河南 信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6日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历史发展中的深刻演变与反思。研究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奠基性的论述出发, 揭示了其理论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面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日益凸显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经典理论中“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一面面临现实挑战。以此为背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它通过重构“新陈代谢断裂”等核心概念, 将对生态危机的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逻辑本身,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与深化。最终,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实现了对经典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独具特色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模式。本文通过这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梳理, 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 其生态意蕴在应对时代挑战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生态危机, 生态文明

From “Transforming Nature” to “Ecological Crisis”

—Reflec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Views on Nature

Dongqing P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yang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13, 2026; published: May 26,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profound evolution and reflection of Marxist views on

文章引用: 裴冬青. 从“改造自然”到“生态危机” [J]. 哲学进展, 2026, 15(5): 352-357.

DOI: 10.12677/acpp.2026.155243

nature throughout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foundational discussions of Marx and Engels, it reveals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in their theories.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roactive aspect of “transforming nature” in the classic theory has encountered practical challeng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ecological Marxism emerged, reconstructing core concepts such as “metabolic rift” to deepen the critique of ecological crisis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capital logic itself, achiev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Marxist views on nature. Ultimately, the vitality of theory lies in guiding practice.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a mod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views on nature and local practice, has achieve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c theory, contributing unique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models to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rough this historical and logical unified review,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Marxist views on nature is an open and developing theoretical system, whos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continue to glow new vitality in responding to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Keywords

Marxist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这种“改造”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逐步将人类引向了一个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时代——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显性挑战。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指导了我们一个多世纪社会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长期以来，一种流行但片面的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然而，深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内核便会发现，他们的自然观远比这种简单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技术决定论”要复杂和深刻得多。经典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指出了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实践本质，更前瞻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破坏。只是，在追求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其理论中“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一面被片面放大和孤立理解，而其内在的、深刻的生态批判维度则一度被遮蔽或忽视。

本文的论述将沿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自身的发展逻辑展开。首先，我们将重返理论原点，厘清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观中辩证统一的两个面向：即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遭遇异化、导致“新陈代谢断裂”的自然。其次，我们将聚焦于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讨这一理论流派如何直面经典理论与生态现实之间的张力，通过系统的理论批判与建构，将生态危机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激活、辩护与深化。最后，理论的价值在于观照现实。我们将考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形态——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是理论“从改造自然到尊重自然”的认识飞跃，更是在现有社会框架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

2. 经典奠基：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观的辩证内核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然观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之上、充满辩证张力的思想体系。它同时包含了人类通过实践与自然互动的能动性，以及对这种互动在特定社会关系下发生异化的深刻批判。理解这两个层面的统一，是把握其完整生态意蕴的关键。

(一) 作为实践基础的人化自然与“两个和解”理想

马克思超越了过去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自然观，将自然纳入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他首先肯定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与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紧密相连([1], p. 209)然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静态的直观，而是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实现的动态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精确定义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 pp. 207-208)人类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使之满足自身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然，很大程度上是“人化自然”，是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烙印的自然。

这一实践观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视为相互制约、统一于生产实践的双重维度。因此，他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阶级对立的消除，更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 pp. 185-186)。在这里，对自然的“控制”并非为满足无限贪欲的掠夺，而是在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理性调节，其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然系统的可持续存续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超越单纯功利计算的生态价值理想。

(二) 资本主义批判视域下的自然异化与“新陈代谢断裂”

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停留于对理想关系的抽象描绘，而是将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的现实。他们敏锐地洞察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无限追求利润的驱动下，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与“断裂”。

首先，自然被降格为纯粹的“有用物”。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自然界在它眼中只剩下工具价值。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3], p. 90)。其次，这种对自然的掠夺与对人的剥削是同一进程的两面。工人的异化劳动，使得他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类本质相异化，同时也导致他们与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界相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成为劳动异化的直接表现和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新陈、土地、矿产乃至清洁的空气和水，都被卷入商品交换的漩涡，其内在的生态价值被抹杀代谢断裂”这一概念精辟地概括了这种扭曲的极致状态。他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指出，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人口与土地的分离，人类消费后产生的废物无法作为养分回归土地，而土地的产品被远距离运走，其养分消耗得不到补偿。这种“断裂”不仅破坏了土地可持续的生产力，也污染了城市环境。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2], p. 57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发出了著名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 pp. 559-560)。“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雄辩地证明，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绝非边缘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缺陷和系统性后果。它从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上，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关联。

3. 理论反思与深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建构

二十世纪，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后，全球生态危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爆发。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与现实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实践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在此背景下，一批西

方学者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并发掘、阐释和拓展其生态批判维度，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们的工作，可概括为对资本主义的“三重批判”与生态社会的愿景构建。

（一）制度根源批判：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或技术应用本身，而在于驱动这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逻辑——资本增殖。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遵循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标准的“经济理性”，它与以生态系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理性”根本对立[5]。在“经济理性”的统治下，环境保护成本被视为需要最小化的外部因素，短期的利润回报永远优先于长远的生态健康。

詹姆斯·奥康纳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一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当今资本主义还面临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劳动力条件等)之间的第二重矛盾([6], pp. 258-260)。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必然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等外部前提，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并反过来限制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将生态危机提升到了与经典经济危机同等重要的、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的高度。

（二）生产与消费模式批判：异化消费与虚假需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还将批判延伸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他们指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并维持利润，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地创造了“异化消费”模式。威廉·莱斯在《满足的限度》和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认为，人们将消费当作在异化劳动中失去的自由的补偿，从而沉溺于对商品的无限追逐中。广告和媒体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刺激着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过度消费[7][8]。

这种“异化消费”模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维系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它极大地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催化剂。资本主义体系因而陷入一个悖论：它必须持续刺激消费以维持自身，但这种持续增长的消费终将触及生态承载力的绝对极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揭示了现代生态危机与日常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之间的深层联系。

（三）全球维度批判：生态掠夺与“人类世”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进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也扩展至全球范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分析了“生态帝国主义”现象，指出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全球贸易体系、污染产业转移、有毒废物出口以及生物剽窃等方式，将本国的生态成本和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9], p. 73-85)。这暴露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固有的不公正性——全球北方享受消费的成果，而全球南方则承受着环境破坏的主要代价。

近年来，关于“人类世”的讨论为这一批判提供了新的地质历史尺度。“人类世”意指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演化主导力量的新地质时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类世”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世”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逻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应对“人类世”的挑战，需要超越以技术治理和霸权国家主导的“地球系统治理”方案，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10], pp. 50-59)。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消费模式和全球体系的系统性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力地回击了“马克思主义缺乏生态维度”的指责，更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发展为一套全面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批判武器。他们的工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经典形态向一个更具时代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形态的深刻发展。

4. 实践飞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与发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回应现实和指导实践的能力。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特别是其经过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深化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了最生动、最富创造性的实践与发展。这并非简单的理论应用，而是一个结合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与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再创造和制度再创新的过程。

（一）从“征服自然”到“生命共同体”：理念的范式转换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向自然开战”、“人定胜天”成为主导性的口号，这反映了当时发展生产力、摆脱一穷二白状态的急迫需求。然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环境代价，促使人们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晶，便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提出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目标的确立。

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理念，是这一范式转换的哲学基石。它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深刻揭示了自然各要素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系统性。这一理念超越了将人与自然简单对立或视自然为纯粹资源的传统思维，也与西方某些“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排除在自然之外的论点不同。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思想，同时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智慧，强调人类是生命共同体中有责任、有能动性的关键一环，人类的福祉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休戚与共。

（二）从资本逻辑到绿色发展：发展观的深刻转变

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的生态危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绿色发展观。这一理念绝非否定发展，而是对“发展什么、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重新定义。它打破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包括：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通过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如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行河湖长制林长制等。这些举措旨在从生产和消费两端，约束和引导资本力量，使其服务于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而非成为生态破坏的推手。

（三）从全球危机到中国实践模式：共同家园的生态维度

面对生态危机这一全球性挑战，中国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将生态文明建置于构建人类共同家园的宏大框架之下。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治理，推动达成《巴黎协定》，承诺“双碳”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呼吁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迈向现代化的新路径。它证明，高质量的发展与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可以协同共进，人民的幸福生活与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相得益彰。中国这一生态文明，正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和解”理想在二十一世纪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它不仅是对本国人民和自然的责任，也是对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贡献。

5. 结论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的深刻剖析，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内在关联的系统揭露，再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的开拓性实践，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完成了一场持续的、富有生命力的反思与发展之旅。

这一历程清晰地表明：第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深刻生态维度的、辩证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在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历史地、批判地考察。第二，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人类改造自然的一般活动，而是这种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异化为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特定组织形式。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支配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制度与价值逻辑。第三，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焕发生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及世界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创新，代表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代发展的新高度和前进方向。

展望未来，全球生态危机依然严峻复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提供的批判武器与建设性智慧，将继续指引我们深刻反思发展模式，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的人与自然新关系。这条从批判“断裂”到追求“和解”的思想与实践之路，远未终结，它将在应对新的生态挑战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安德烈·高兹. 经济理性批判[M]. 伦敦: 维索出版社, 1989.
- [6]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 臧佩洪,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7] 威廉·莱斯. 满足的限度[M]. 多伦多: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1976.
- [8]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9]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 肖峰,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0] 孟天昊, 杨婧珮. 人类世生态危机与“地球系统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反思与回应[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24(4): 50-59.